

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

顾宝昌 徐 毅

【提要】 本文认为,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与生育妇女的文化程度、居住地、民族、原有子女性别等因素相关;出生统计中的瞒、漏、错报是引起报告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非法运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而引起的性别选择性流产亦有一定影响;溺弃女婴并非重要因素,但在偏僻地区时有发生,应引起重视,加以杜绝。本文建议加强计划生育部门与研究人员的合作,扩大研究范围,对此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寻求彻底解决途径。

作者: 顾宝昌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徐毅 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副编审。

当前中国婴儿的出生性别比态势及其升高的原因是国内外人口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并非偶然。20多年来,中国成功地推行了计划生育。在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生育率急剧下降而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必然也应该逐步提到日程上,成为关注的热点。

从1982~1990年,中国进行过5次与生育有关的全国性调查,包括第三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数据显示,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婴儿的出生性别比偏离自然属性103~107的常值。根据“四普”100%的资料,1989年出生性别比达113.8^①。近两年的抽样调查及部分省市的资料说明,出生性别比不正常的态势依然在发展。

根据中国陆续发表的数据,国外一些人口学者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正常的升高是溺杀女婴所致。这就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作为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根据之一。对这样一个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产生的人口问题,本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发生的现象,如韩国也明显存在,在中国却被蒙上了明显政治色彩的阴影。作为一个敏感的禁区,国内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甚为缺乏。199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彭珏云主任亲自提出将出生性别比的研究工作纳入国家计生委“八五”期间第一批人口及计划生育研究课题,研究内容包括“我国出生性别比是否存在真性性别比失调,失调程度,主要地区,形成原因。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长远后果的预测分析。切实可行的防止性别比失调的对策及具体措施”。^②由于这一有远见的措施,使出生性别比研究的禁区得以打破。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承担了出生性别比的研究课题。为使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够深入进行,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组成了联合课题组,以期对出生性别比问题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一、研究方法

首先对国内外出生性别比的研究资料进行文献分析。国外的资料重点放在近年来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研究较多的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国内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性别比存在升高的态势,但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的认识则有原则的分歧。国内学

①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三册,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44~565页。

② 《人口动态》,1991年第6期40~42页。

者认为统计不实是性别比升高的首要原因,胎儿性别鉴定亦有影响,极个别地区存在溺弃女婴问题;美、澳等国一些人口学家则将溺婴放在第一位,而瑞典有些学者认为是抱养所致。在对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工作分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以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主的分析。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人口所合作,利用四普等数据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并写出论文^①。不少学者如乔晓春^②、涂平^③、高凌^④、李涌平^⑤等相继用四普10%抽样资料、1%抽样数据带的数据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

(二)实地调查。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计生委的联合课题组在1992~1993年分4次对台州地区的温岭、临海、玉环、黄岩、仙居、三门、天台、椒江等8个县市,温州市所辖的瑞安市、乐清县,金华市所辖的义乌市及丽水地区的青田县等共12个县市,就出生性别比问题与当地的党政领导、计划生育部门及医务人员进行座谈、现场调查等。

(三)医院产房出生登记分析。1983年谷善祖等收集1960~1981年19个省市88个医疗单位的产房登记资料,出生性别比为108.4;肖坤则等在“中国围产儿素质的调查研究”的文章中提供了1986年10月至1987年9月末全国29个省市的出生缺陷监测数据,1242465例围产儿的性别比为108.05;全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在1988~1991年全国出生缺陷动态监测点中得到的围产儿性别比分别为108.0、108.3、109.1和109.7。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以来围产儿性别比已超过109。

(四)专题调查。均在浙南高出生性别比地区进行。回顾性调查主要旨在搞清从1986~1991/1992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态势,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调查不正常升高的主要和次要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案。

在浙南地区进行了引产儿性别比的调查。近年来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连续发文禁止使用B超等对胎儿进行非医学原因的性别鉴定,多数省的计划生育条例也包括了相同内容的规定。为了了解胎儿性别鉴定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1993年在浙南地区的10个县市进行了引产胎儿性别比的调查。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说明,胎儿性别鉴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有明显影响。

二、中国当前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态势

(一)在80年代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但自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升高。如表1和图1所示,198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出生性别比均在110以上,出现了明显偏离正常值的异常升高且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与出生孩次的关系。根据人口普查和生育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孩开始陡然增高,并且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不正常。增高幅度大是又一特点。如“四普”资料全国1989年一孩出生性别比为105.2,二孩陡然升至121.0,二者相差15.8个百分点(见表2)。城、镇、乡分孩次性别比均呈同一模式。

① 曾毅、顾宝昌、涂平、徐毅、李伯华、李涌平:《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1期。

② 乔晓春:《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人口与经济》,1992.3。

③ 涂平:《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探讨》,《人口研究》,1993.1。

④ 高凌:《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人口研究》,1993.1。

⑤ 李涌平:《婴儿性别比及其和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普查的结果和所反映的现实》,《人口与经济》,1993.4。

表1 全国1960~1992年出生性别比

年份	出生性别比	年份	出生性别比	年份	出生性别比
1960	110.3	1971	105.2	1982	107.2
1961	108.8	1972	107.0	1983	107.9
1962	106.6	1973	106.3	1984	108.5
1963	107.1	1974	106.6	1985	111.4
1964	106.6	1975	106.4	1986	112.3
1965	106.2	1976	107.4	1987	111.0
1966	112.2	1977	106.7	1988	108.1
1967	106.6	1978	105.9	1989	111.3
1968	102.5	1979	105.8	1990	—
1969	104.5	1980	107.4	1991	—
1970	105.9	1981	107.1	1992	113.0

资料来源：(1) 1960~1988年来自《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分析数据卷》(三)生育节育第12页表3-3-1；
(2) 1989年来自《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3) 1991年资料系1992年38万人口抽样调查零岁组性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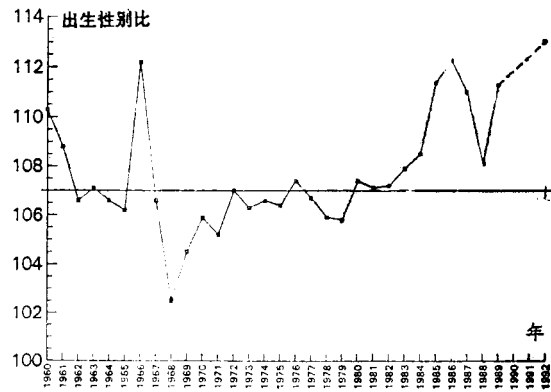


图1 1960~1992年全国出生性别比

(三) 城乡差异。总的来说，中国当前的出生性别比，是农村高于城市，而镇为最高。

“四普”资料表明，1989年出生性别比城市108.90、镇112.31、农村111.60。镇人口实际上是城乡之间的一个过渡人口，在这个过渡人口中，出生性别比升高异常严重，值得注意。

(四) 生育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大部分生育妇女受教育程度在中学以下，其生育的出生性别比及分孩次性别比均高；少数生育妇女受到大专以上教育，出生性别比接近正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中学以下妇女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用“四普”1%抽样数据带计算，1989年出生性别比小学以下为112.5、小学为114.2、中学为116.2、大专及以上为110.7，以中学和小学程度妇女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为最高^①。

表2 1981~1989年全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年份	总计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五孩及以上
1981	107.1	105.1	106.7	111.3	106.5	114.1
1982	107.2	106.6	105.2	109.4	112.9	109.9
1983	107.9	107.8	107.2	109.5	104.7	112.1
1984	108.5	102.5	113.3	113.0	115.3	127.3
1985	111.4	106.6	115.9	114.1	126.9	117.3
1986	112.3	105.4	116.9	123.1	125.3	123.5
1987	111.0	106.8	112.8	118.9	118.6	124.6
1988	108.1	101.5	114.5	117.1	123.1	108.7
1989	113.9	105.2	121.0	124.3	131.7	129.8

资料来源：1981~1988年同表1资料来源(1)；1989年来自《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3册536~541页。

学为114.2、中学为116.2、大专及以上为110.7，以中学和小学程度妇女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为最高^①。

(五) 不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先进的地区和长期落后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均基本正常。根据“四普”调查，1989年出生性别比在103~107的共有7个省市，即上海(104.6)、北京(107.3)、贵州(102.7)、西藏(103.5)、青海(104.1)、新疆(104.6)、宁夏(106.8)；而发展水

①同第42页注③

平在两者之间的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则较高（见表3）。

表3 1989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

地区	出生性别比	地区	出生性别比
贵州	102.7	天津	110.1
西藏	103.5	辽宁	110.1
青海	104.1	湖南	110.2
新疆	104.6	江西	110.5
上海	104.6	陕西	110.7
宁夏	106.8	安徽	111.1
北京	107.3	广东	111.6
黑龙江	107.5	河北	111.7
云南	107.6	四川	112.5
内蒙古	108.5	江苏	114.4
吉林	108.5	山东	114.5
山西	109.4	海南	114.8
湖北	109.4	河南	115.6
福建	109.5	广西	116.3
甘肃	109.6	浙江	117.1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第一册58～59页，表1～16。

关。高凌根据“四普”1%的数据带计算，发现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原为女儿户的二孩性别比为138，三孩为188，四孩为182，五孩为204；而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为101，三孩为108，四孩以上为128。已有2个以上男孩的，下次生育中则出现低性别比。这说明二孩以上生育或生育的申报中，对男孩强烈的性别偏好而形成的人为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起着主导作用。

表4 1989年汉族及少数民族出生人口及出生性别比

	出生人数	男	女	出生性别比
全 国	24 624 887	12 969 084	11 655 803	111.27
汉 族	22 287 670	11 760 249	10 527 621	111.71
少数民族	2 337 017	1 208 835	1 128 182	107.15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册，1993年表3～28，803～810页。

三、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生性别比不正常升高是伴随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出现的。根据对全国数据的分析及对浙江省高出生性别比地区的专题调查，发现出生性别比升高所表现的女婴丢失问题，有假性的因素，也有真性的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生统计上的瞒、漏、错报是形成中国目前统计数据中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人口所和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合作的文章“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用存活反推法对“四普”数据估算，80年代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部分的

（六）民族间的差别。根据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的出生性别比低于汉族及全国平均值。1981年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07.8，少数民族为104.5^①。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民族的统计数据，1989年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1.27、汉族为111.71、少数民族（包括55个少数民族、未识别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籍者）为107.15（见表4）。少数民族的出生性别比从整体上看较汉族为低，这与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水平还比较高，受社会因素影响较少等有关。但近年来百万人口以上的18个少数民族中的壮族、满族、哈尼、侗族等，出生性别比也升高到110以上，值得注意。

（七）不同孩次出生性别比与原存活孩子性别之间的关连问题。李涌平、高凌等文章利用“四普”数据分析发现，一孩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与原存活孩子的性别密切相关。我们课题组的专题调查亦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二孩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与原存活女孩数呈正相

^① 柳春美、李竹：《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与经济》专刊，1983年7月。

50~75%是由漏报女婴造成的,这对分析全国问题有重要意义。

具体到全国各地,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水平不同、基层统计网络健全程度的区别,统计因素在女婴丢失上所占比例不尽相同,且查清极为困难。浙江省和山东省的资料说明男、女婴的瞒报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某些基层干部瞒报多于生育夫妇瞒报。一些基层干部反映男婴漏报多于女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当上面检查严格时,育龄夫妇愿将瞒报的男婴补报,认为罚款也值得。而要查清漏报女婴则极困难,不愿意为超生女婴罚款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纯女户怕承认瞒报后做“结扎”。

从“四普”及实地调查的数据分析,农村中统计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主要的。但是高凌用“四普”1%的数据带计算,发现1989年和1990年上半年出生漏报,市高于镇,镇高于农村。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存活孩子与死亡婴儿漏报的都多,使农村出生孩子数与申报出生婴儿数差值变小。但城市也存在着统计漏报问题,亦应予以重视。

(二)选择性流、引产对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文化对人们的生育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广泛流传于民间的预测胎儿性别的秘方,不能认为是完全无效的。李伯华等用1%人口生育率资料计算得出1930~1981年间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08.4^①,高于正常值1.4个百分点,可见社会因素的介入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近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二孩以上出生性别比大大偏离正常值。根据“四普”数据,1989年二孩出生性别比高达120.4,这不是以上所说的民间秘方能办到的。因此,需要调查清楚中国是否有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的情况。妊娠中期尤其是怀孕5个月以后,通过B超检查容易判定胎儿的性别。据卫生部、国家海关总署及医药管理总局等反映,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引进B超,80年代大量进口,但全国没有准确的进口数据,据粗略的保守估计在一万台以上,而80年代中国已具有生产中档B超机的能力。现在全国大部分县的区级以上中心医院均装备有进口或档次较高的国产B超机。近年来计划生育系统的县级、乡镇级的服务站也相继配备了B超机。据1991年底统计,全国已有2277个县建立了县级计划生育服务站。国家计生委为其中1/4的县站装备了B超机,给2.9万个乡、镇计划生育所中的1/3,即9000个所也配备了B超机。根据在浙江4个县市B超机的调查,青田有8台、宁海11台、瑞安13台、乐清15台、平均每县12台。根据最近福建省泉州市计划生育指导站的资料,该市所属的140个乡镇的计划生育所已配备B超381台,平均每个乡、镇计生所2.7台。保守估计,中国目前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计划生育部门等也拥有10万台以上的B超设备。B超等医疗装备程度已相当普及,只要其中一部分被医德不高的人用以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则造成的影响将是极大的。中国出生性别比高的地区往往也正是B超较普及的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和B超的普及在时间及地域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

1992年在浙南地区12个县市出生性别比的回顾性调查中,有6个县市认为怀孕期间利用B超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选择女婴引产是当地出生性别比高的首位原因或重要原因。在浙南以台州地区为主的10个县市进行的引产胎儿性别比的前瞻性调查数据显示,1993年全年引产性别比为86.7,明显地女多于男。引产性别比与胎次有密切关系,一胎引产性别比为108.6,二胎引产性别比为69.9;与现存活子女的性别关系更为密切,“纯女户”的妇女的引产性别比为51.10。这一调查的结果支持B超在鉴定胎儿性别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结论。

“四普”数据分析中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省出生性别比不仅在农村中不正

① 李伯华、段纪亮:《对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估计》,《人口与经济》,1986.4。

常，在城市人口中也不正常；有的地方市和镇的出生性别比甚至比农村的还高。这种情况在山东、河南、广东、江苏、福建、山西、江西等省较突出（见表5）。这些地区尤其是城市的出生性别比高，不可能是因为大量女婴漏报、虐待和溺弃，而更可能与B超鉴定有关，值得深入研究。

表5 1989年山东等7省市、镇、县的出生性别比

	山 东	河 南	广 东	江 苏	福 建	江 西	山 西
总计	114.50	115.60	111.60	114.40	109.50	110.50	109.40
市	114.23	112.15	112.82	111.40	112.13	111.03	110.01
镇	114.48	115.29	102.33	109.27	118.96	113.58	114.68
县	114.55	115.90	110.07	115.14	108.47	110.28	109.00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3，第一册58~59页，第三册530~535页。

性别鉴定引起的选择性流、引产应引起高度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策规定自行选择流、引产是合法的。

（三）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研究，正常情况下女婴死亡率应低于男婴死亡率。国际公认，1岁以下婴儿死亡性别比为130。最近涂平、孙福滨等对“四普”死亡漏报进行研究，得出1989年的婴儿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男婴死亡率为35.5%，女婴死亡率为40.40%；男婴死亡率1989年较1981年“三普”时降低3.34个千分点，女婴却提高了3.53个千分点^①。河南省对1991年10个县市5岁以下儿童死因分析中发现，男孩与女孩死亡比例为1:1.3，婴儿死亡占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85.80%^②。女婴的死亡高于男婴最合理的解释是对女婴疏于照顾，有病不如男孩能得到及时治疗。婴儿死亡性别比问题本来与出生性别比是两回事，但因婴儿死亡，尤其是新生儿死亡存在着生不报出生、死不报死亡的问题，因此对出生性别比数据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出生性别比异常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异常，作为伴随生育率下降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二者所反映的重男轻女的社会问题却是紧紧相关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婴儿死亡性别比异常的分析研究，必然也应该成为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领养女婴不报出生。这里所说的领养与一般办理法律手续的收养有本质区别。农村有些育龄夫妇生育女儿后，为再生男孩往往将女儿放在亲戚家，本人报孩子死亡，或称已送别人，而领养后既不报出生也不报领养。这是瞒报女婴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从统计的出生性别比上反映的却是女婴缺少，引起报告的出生性别比升高。

（五）弃婴溺婴问题应当重视。溺婴仍然存在，但为数极少，且为法律所不容，一经发现，即应依法处理。值得重视的是弃婴现象近年来有所发展。在浙南12个县市出生性别比回顾性调查中，有的县认为女婴出生后下落不明是出生性别比增高的主要原因，这类地区多为偏僻的山区。各地的零星资料表明近年来弃婴有增加趋势，且大部分为女婴。从全国的情况分析，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形成出生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现象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精神文明不相容，应予杜绝。

上面讨论了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导致产生这些社会行为的经济社会背景也是应当深入研究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把男女平等写进宪法的国家里，应当提倡和着力实现男女平等，而近年来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升高则是中国妇女地位受到损害的一个社会信号，

① 孙福滨：《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及部分省区死亡漏报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3，2。

② 高清欣等：《1991年河南省10个县市5岁以下儿童死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3，4。

应引起充分重视。

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对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希望生育男孩,至少生育一个男孩,使家族得以传宗接代成为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中国沿海地区首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将大量的收入放在建房、婚礼、丧礼、修坟造墓上,就是传统观念的典型反映。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文化滞后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千万不能忽视。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计划生育一个部门能办到的,必须由全社会来关心,采取措施提高妇女地位,把移风易俗、清除重男轻女、实现男女平等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出生性别比研究进展与对策

(一)突破了对出生性别比认识上的禁区,国家决策部门将出生性别比保持正常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个有着重男轻女文化传统的社会中,随着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出生性别比异常问题的出现是并不奇怪的。当人们的生育孩子数量减少到最少数量时,对孩子性别的关注成为突出的问题,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又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出生性别比这一简单比值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家计生委领导的鼓励 and 指导下,出生性别比课题组经过两年的深入研究工作,坚持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路子,不回避问题,如实反映情况,在搞清情况的基础上,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出论文及内部研究报告13篇,包括由北京大学人口所及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的6位专家于1992年10月经国家计生委转呈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上升的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1993年3月中央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彭珏云主任发言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出生婴儿性别比呈现升高趋势”。1993年4月24日宋平、彭珏云同志召集了以出生性别比问题为主题的人口问题座谈会。《人民日报》在4月25日以“宋平、彭珏云与各界人士座谈人口问题,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应引起重视”为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消息。《中国人口报》在4月26日第一版发表了“宋平、彭珏云召开第二次人口问题座谈会强调高度重视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的消息。这是中国在国家级报刊上第一次正式报导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强调要高度重视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

(二)纠正了国际舆论的偏见。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研究,除了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时国内有文章发表外,近年来一直处于外国学者垄断的局面。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表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溺女婴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首位原因。这些文章在国际上造成很大影响,但中国的学者没有文章发表。直至1992年10月由北京大学人口所和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的6位学者联名以“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北京国际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国学者以翔实的数据结合中国的国情,对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作了分析,起到了纠正国际视听的作用。1993年6月美国人口理事会出版的《人口与发展评论》(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第二期发表了这篇文章,英国的《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在1993年9月18日也摘发了这篇文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人口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学术文章。现在国际上再没有人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是溺杀女婴了。不仅在中国大陆,南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存在着极为相似的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且随胎次升高而急剧升高,这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国家和地区遇到的一个历史上没遇到过的问题,

应当共同深入研究。

(三) 搞清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态势及形成原因。在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中,借助于80年代以来5次与生育有关的全国性调查,尤其是第四次普查的数据进行了性别比基本态势的分析;同时以中国出生性别比高的浙南地区为点,进一步分析基本趋势及形成原因;为搞清B超在胎儿性别鉴定中的作用设计了引产胎儿性别的前瞻性调查。这些研究结果的相互验证,使我们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基本态势和形成原因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1992年生育抽样调查及一些省的资料可以看出,当前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各种社会因素更趋复杂,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研究出生性别比的态势及原因的目的在于解决出生性别比的失调问题。为此,我们针对不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方案。

1. 扩大研究范围。仅从浙江省的研究来提出全国性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扩大研究范围应以当前出生性别比高、农业人口比例大、对相邻省份有一定代表性的地区为对象。

2. 研究部门与国家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密切结合。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生育率下降中难以避免的,即使国家不推行计划生育,完全由人们自由选择生育数量及性别,由于中国生育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出生性别比仍可能继续出现失调。中国是推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在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政策的过程中,从宏观管理上对出现的如性别比失调等人口问题,主动与研究部门密切合作,并参予必要的研究工作,则将大大有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调的趋向,实现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为创造一个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良好人口环境作出贡献。

出生性别比研究成果部分参考资料

1. 顾宝昌:《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

2. 徐毅、郭维明:《浙江省出生性别比问题》,1992年6月,内部研究报告,上报国家计生委。

3. 曾毅、顾宝昌、徐毅、涂平、李伯华、李涌平:《关于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上升的报告》,报国家计生委转呈党中央、国务院,1992年10月。

4. 曾毅、顾宝昌、涂平、徐毅、李伯华、李涌平:《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暨人口统计技术国际研究会上做学术报告,《人口与经济》1993.1,美国《人口与发展评论》,1993年第2卷。

5. 徐毅:《出生性别比的研究现状》,《人口动态》1992年第5期。

6. 南忠吉、徐毅:《应重视B超对婴儿性别比失常的影响》,《人口内参》第5期,1992年12月。

7. 徐毅:《关于浙江12个县市出生性别比的分析》(内部研究报告),1993年2月上报计生委领导。

8. 出生性别比课题组:《关于浙江省12县市关于出生性别比情况》,1993年3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参阅材料。

9. 顾宝昌、徐毅、涂平等在宋平、彭珏云召开的第二次人口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1993年4月24日,199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4月26日《中国人口报》刊登。

(下转第18页)

早期决定分娩方法,促使孕妇加强自我保健,通过产前诊断实行优生,发现孕妇因健康状况不允许怀孕分娩则及时终止。可见产前检查也是降低婴儿死亡,实现优生的手段之一。大部分郊县妇女参加产前检查次数较少。这可能是因为:(1)郊县居民多居住在农村,居住较为分散,距医院或妇幼保健院较远;(2)多为自费医疗,经济条件较拮据;(3)对产前检查的意义不十分清楚,所以并不十分积极主动参加产前检查。应该更广泛地宣传产前检查的意义,尤其是对郊县妇女,以进一步地完善产前检查制度。这样可及时了解孕妇的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指导孕产妇正确服药,这样既可实行优生,减少出生缺陷和先天畸形患儿,又可降低婴儿出生后患病的可能性,从而减少婴儿死亡,降低婴儿死亡率。

六、以往的研究表明,男性婴儿死亡比例大;婴儿父母文化程度低,婴儿死亡比例较大。本文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父母文化程度高,懂得一定的自我保健及婴儿护理知识,亦不会过多过密生育,对减少婴儿死亡有一定的作用;而且他们易于理解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常识,对子女在素质上的要求胜过对数量的要求,也对减少婴儿死亡有一定的帮助。

七、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婴儿死亡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婴儿本身的状况,如出生体重、孕周、出生缺陷等。婴儿出生状况不佳或者说出生质量不高,是婴儿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类为婴儿父母的社会因素,如父亲文化水平、母亲职业、母亲医疗保健状况、母亲参加产前检查的次数等。尽管在市区的多因素分析中只得到“父亲文化水平”这一个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但它代表了相似的同类因素。

参考文献

1. 高尔生等:《中国报告婴儿死亡率》,《医学人口研究》,1990,6。
2. 顾杏元:《中国八省市婴幼儿死亡率》,中国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1990,2。
3. 周有尚等:《中国婴儿死亡率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89,3(35~46)。
4. 沙神才:《中国婴儿死亡率研究》,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国际研讨会,北京,1991,8。
5. 涂平:《上海、陕西婴儿、儿童死亡率影响因素之比较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0,1(52~55)。
6. 郑怀美等:《妊娠生理与妊娠病理》,《妇产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7. 《美国婴儿死亡监测资料概述》,《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1988,5。
8. Poston, D. L, Jr:《中国婴儿死亡率模式》,美国康奈尔大学。
9. The Influence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on Fertili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Region, Population Research Leads, 1985。
10. William Lavelly, William M. Mason and Hiromi Ono: Chinese Infant Mortality, 1950~87: An Assessment of Data from the IDFS and the 2 Per 1000 Survey, Draft 1, August 19, 1991。
11. Susan H. Cochrane, K.C. Zachariah, Infant and Child Mortality as a Determinant of Fertility,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本文责任编辑:杨子慧)

(上接第48页)

10. 出生性别比课题组:《关于浙江省出生性别比研究的阶段报告》,1993年6月,上报国家计生委领导。

11. 徐毅:《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1993年第3期。

12. 徐毅:《我国出生性别比的研究进展》,《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年。

13. 徐毅:《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区域差别分析》,第四次人口普查“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发展”课题的子课题论文。

(本文责任编辑:徐莉)